

• 政治学研究 •

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

林 冈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2009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2010年初的两次“立委”补选以及年底的“五都”选举表明,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从2008年的低谷回升。鉴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有源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基本支持者,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统“独”议题、两岸关系、涉外关系方面存在较明显的“蓝、绿”分野,有理由预料均衡两党体系和政党轮替将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具有形塑作用,台湾的选举制度有利两党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 选举制度; 政党体系; 国民党; 民进党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1)05-0084-08

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以来,台湾内部出现了以两党对抗为主、多党并存为辅的局面。2008年国民党以明显优势,从民进党手中夺回执政权,其它小党迅速泡沫化。2009年台湾十七个县市选举、2010年初两次“立法委员”(以下简称“立委”)补选以及年底“五都”选举后,民进党的气势从2008年的低谷回升。特别是在“五都”选举中,民进党虽然未能拓展其中北部的执政版图,但在得票数上明显领先国民党。岛内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议题。民进党的回升势头,是否将延续到2012年的“立法院”和“总统”大选?台湾在未来是否会出现均衡两党体系(Two-Party System)?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

一、主要概念和基本理论

政党体系(Party System)在广义上指的是由政党数目、规模和意识形态距离所构成的系统。迪维尔热(Duverger)根据政党数目对一党体系、两党体系和多党体系作了区分。^{[1] (P206)} 萨托利(Sartori)根据意识形态距离和政党体系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程度,将政党体系区分向心性极化(Centripetal Polarization)和离心性极化(Centrifugal Polarization)两大类,前者包括一党独大制与两党制,具有同质、稳定特点;后者指括多党制,具有较高的分歧性与不稳定性。^{[2] (P292)} 佩尼斯(Paul Pennings)和兰恩(Jan-Erik Lane)则将政党体系定义为政党竞争与合作的结构。^{[3] (P5)} 本文根据有效政党数目(Effec-

收稿日期:2010-10-10

作者简介:林冈(1953—),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民主理论、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研究》(批准号:10BZZ040)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tive Number of Parties) 对政党体系予以狭义的界定,所谓两党体系指的是有效政党,而未将泡沫型政党考虑在内。根据雷伊(Douglas Rae)的定义,两党体系指的是两大政党的得票率总和超过90%,且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超过70%。^{[4] (P52)} 本文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将均衡两党体系界定为:两个主要政党在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超过90%,两党得票率和议会席次率的差距少于10%。

根据让·布隆德尔(Jean Blondel)的理想分类,政党体系可以根据政党的数目和大小区隔为:(1)两党体系,即两党在议会的席次比为50-50到55-45之间(假设总席位是100,下同);(2)两个半政党体系,例如三个政党的席次比为45-40-15;(3)一党优势下的多党体系,例如45-20-15-10-10的席次比属于此类;(4)不具一党优势的多党体系,席次比可能呈现为25-25-25-15-10。^{[5] (PP184-187)} 马尔克·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莱茵·塔克佩拉(Rein Taagepera)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有效政党数目可以通过政党得票率或议会席次比例来加以计算,其公式是用1除以主要政党得票率(或席次率)的平方和,即 $N_v = 1 / \sum v_i^2$,或者 $N_s = 1 / \sum s_i^2$ 。^{[6] (P4)} 根据这一公式,如果两党得票率为50%-50%,有效选举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Elective Parties)就是2,如果是55%-45%,有效选举政党数目就是1.98,如果三党得票率是45%-40%-15%,有效选举政党数目即2.33。对政党席次率也可进行同样的计算,以得出有效议会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Parliamentary Parties)。本文将结合上述方法,探讨台湾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

政党体系的变迁,跟政党数目、规模和意识形态以及选举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本文所讨论的选举制度,不但指涉台湾“立法院”选举所采取的以单席位选区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两票制,也包括台湾各级领导人选举所采取的相对多数当选制。根据迪维尔热(Duverger)法则和假设,单席位选区制有利于形成两党体系,比例代表制有利形成多党体系。^{[7] (P124)} 但也有人认为,比例代表制不是导致多党体系的原因,而

是后者的结果,^{[8] (P375)} 难以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来改变已经结构化了的政党体系。^{[9] (P85)} 这种观点认为,选举制度只是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10] (P253)} 上述反对意见,实际上是将选举制度视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而非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对于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究竟有何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单席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一样具有产生多党制的倾向。^{[11] (PP146-147)} 但另一项新近研究却证实了选举制度对有效议会政党数目的明显影响:采用多数表决选举制度的国家的有效议会政党数平均值为2.42,采用比例代表制国家的有效议会政党数平均值为4.45,而采用混合选举制度的国家的有效议会政党数平均值为3.54,介于两者之间。^{[12] (P87)} 其实,迪维尔热定律的视角是考察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的影响,而不在于追究选举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同时迪维尔热也认为,选举制度扮演了加速器或制动器的角色。^{[13] (P73)} 本文认为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具有形塑作用。正如萨托利所言,如果选举制度不会产生什么政治结果,政客们就大可不必围绕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拼得你死我活。^{[14] (P27)} 事实上,基于台湾内部“蓝、绿”对立的政治生态,岛内两党体系的形成和2008年“立法院”选举时采取的新的选举制度以及各级领导人选举所采取的相对多数当选制确有很大关系。

二、台湾政党体系的演变

台湾两党体系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演变过程。2000年以前,在台湾政坛比较活跃的主要是国民党(大)、民进党(中)和新党(小)三股政治势力。2000年后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又相继分化出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两个中、小型政党。在2001年和2004年的“立法院”选举后,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台联和其他小党(包括无党籍人士)在“立法院”的席次先后出现过39%-30%-20%-6%-4%和40%-35%-15%-5%-4%的光谱分布,与布隆德尔的两个半政党体系模式有点相似,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为台湾政坛“泛蓝”和“泛绿”两股主要势力的代表者,却不是不

争的事实。中小政党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多极化,而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区多席的选举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

2008年台湾“立法院”选举采取单席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两票制后,政党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曾在政坛上扮演或试图发挥“关键少数”角色的亲民党和台联迅速泡沫化。根据迪维尔热的理论,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的影响通过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和机械因素(Mechanical Factors)起作用。前者指选民不愿将选票浪费在无法胜出的小党身上,而采取策略性的跨党投票行为,从而影响有效的选举政党数目。后者指从选票到席位的转换方式将影响到有效的议会政党数目。^{[15] (PP70-72)}从2008年台湾“立法院”选举,可以看到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台联获得3.53%的政党票,在“区域立委”选票上的得票率却不到1%,就反映了其支持者不愿在“区域立委”选票上作无谓选择的心理因素。新党得到3.95%的政党票,却不参加“区域立委”选举,也是基于对选民这一心理因素的判断。这两个小党都获得了一定的政党票,但因为没有超过5%的门槛,而未能转化为任何席位,就是选举制度中机械因素的作用。同时,新制中的比例代表的名额不到区域“立委”的一半,而且各政党所获区域“立委”和比例代表“立委”席位之和占总席次的比例可以高于政党得票比例而不受影响,造成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党的选票(分别为51.2%和36.9%)和席位(分别为81席和27席)的明显落差,同样也是机械因素的作用。可见,选举制度的设计确能间接(心理因素)或直接(机械因素)影响到政党生态。不过台湾初次尝试新的选制,并未在“立法院”形成均衡两党体系。国、民两党在选举中“区域立委”的得票率(分别为53.5%和38.2%),固然超过了90%,但两党的得票差距超过15%(政党票的差距则超过

14%) ,在席次率上更呈现72%比24%的极不对称状态,只能视为失衡的两党体系。仅就席次率而言,甚至可以称为一党独大体系。^{[4] (P52)}

如果采用上述拉克索和塔克佩拉计算有效议会政党数目的公式,用1除以政党席次率的平方和,则只能得出1.7个有效政党数目。新的选举制度对排挤第三党的功能显然高于对均衡两党体系的诱导作用。

除了历经改革的“立法院”选举制度外,台湾长期实行以相对多数产生地方县市长的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相继将这一选举方式延伸到台北和高雄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对岛内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多数当选制和绝对多数当选制不同,前者有利于形成两党体系,后者则可为两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留在第二轮投票时的政党结盟空间,并不完全排斥多党体系。^{[16] (PP55-59)}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9年到2001年,台湾的23个县、市一共举行了4次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囊括了85%以上的得票率。^①在这12年期间,第三党或无党籍候选人前后一共才获得10个/次县市长席位,占历年92个/次席位总和的比例不到11%,而且都是相对不太重要的县市长席位。参照布隆德尔的分类标准,既然第三党或无党籍人士在得票率和席次率上都未达到半个政党的门槛(15%),台湾政党堪称两党体系。但从国、民两党在四次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都不到90%,席次率分别为53.3%和35.9%来看,与均衡两党体系的标准尚有一些距离。^②不过,从2005年以来的两次县市长选举,可以看到国、民两党的得票率之和均已超过90%,两党的得票率差距也都在10%以内。特别是2009年的县市长选举,除了脱党参选的傅崐萁获得花莲县长职位外,其余16个县市长全为两大政党所囊括。唯在席次率的差距上,与均衡两党体系尚有距离。

①唯一的例外是在2001年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和新党共推新党候选人王建煊候选人参选台北县长,导致新党得票率的明显上升。

②在这四次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共获得39个/次县市长席位,民进党获得33个/次县市长席位,将其分别除以92,得出上述比率。

表1 1989年以来台湾各政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结果

年份	席位	国民党		民进党		亲民党		新党		台联	
		得票率/席位									
1989	23	56.1%	16	30.1%	6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1993	23	47.3%	16	41.2%	6	尚未成立		3.1%	0	尚未成立	
1997	23	42.1%	8	43.3%	12	尚未成立		1.4%	0	尚未成立	
2001	23	35.1%	9	45.3%	9	2.4%	2	9.9%	1	无候选人	
2005	23	51.0%	14	42.0%	6	1.1%	1	0.2%	1	1.1%	0
2009	17	47.9%	12	45.3%	4	无候选人		无候选人		无候选人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989年的数据源自网络维基百科和 Steve Tsang & Hung-mao Ti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8。其它资料源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台湾选举类别与结果线上浏览 <http://vote.nccu.edu.tw/cec/vote4a.asp>

与台湾“立法院”新的选制没有马上带来均衡两党体系相映成趣的是,台湾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时,出现了三党竞争的局面,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5.9%, 43.7%和30.2%,民进党胜出。在1996年开放最高领导人选举时,出现过四组候选人相竞争的局面,在2000年也出现过三组主要候选人。但这些只是新制伊始时的短暂现象。1998年后的“直辖市长”选举和2004年后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均以两组候选人的对决为基本规律。如表2所示,2001年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几

场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和,都超过或接近95%,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则不到5%或略微超过。国、民两党的得票率的差距基本在10%之内。虽然民进党在2008年最高领导人选举和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均偏低,但如与其他数字平均计算,也就相差无几。就当选的席次而言,两党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在两次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和民进党互有胜负;在北、高市长的两次选举中,两党也维系了“北蓝南绿”的对峙格局。随着民进党政治实力的恢复,两党体系的特征将更为明显。

表2 2000年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

党派	最高领导人选举			台北市长选举			高雄市长选举			两市合计		
	2004	2008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国民党	49.89	58.45	54.20	64.11	53.81	60.67	46.82	49.27	49.14	57.85	52.11	56.42
民进党	50.11	41.45	45.80	35.89	40.89	39.33	50.04	49.41	50.86	41.01	44.08	43.58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网站资料整理。其中最高领导人选举的均值,系将某个政党在两次选举中的得票数相加,除以两次选举的有效票数之和而得出。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选举的均值,系将某个政党在某市两次选举中的得票数相加,除以某市两次选举的有效票数之和而得出。两市合计的均值系以某个政党在北高两市两次选举中的总得票数除以两次选举的所有有效票数而得出。

三、民进党政治实力的恢复

2009年县市长选举,带有明显的两党对决色彩。在这次选举中,民进党不但夺回宜兰县,在桃园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基隆市和新竹市的得票数也显著增加,国民党则相形见绌。国民党因为提名作业没有摆平内部矛盾,在新竹县的选票大量流入脱党竞选的张碧琴手中,以险胜告终;在彰化县的得票率虽然不变,但选票流失了2万多张;唯有在苗栗县、南投县和嘉义县等地才有所斩获。

就2009年17个县、市长选举的总体得票

率而言,民进党从2005年的1,764,734票(包括台联的58,243票)增加到1,982,914票,多了218,180票;得票率从4年前的39.5%提高到45.3%,增加了5.8%。与此相反,国民党的得票数比4年前“泛蓝”阵营总得票数2,331,337张少了236,819票,得票率由52.2%下降为47.9%,减少了4.3%。两党得票率合计93.2%,差距2.5%,符合均衡两党体系的标准。但如果将脱党参选花莲县长的傅崐萁和张志明所获得的113,127张选票计入“泛蓝”阵营的票源,后者所实际流失的票数应为123,692张,得票率应为50.6%,而不是47.9%。根据这种算法,两大阵营得票率合计将近96%,差

距在 5% 左右。同时县市长选举的投票率由 2005 年的 67.5% 下降为 63.3% ,有效票数减少了 9 万多,但远远不及国民党所流失的 23 多万张选票,也不及“泛蓝”阵营所流失的 12 万多张选票,可见还是有不少选民转投了民进党候选人。

民进党在 2009 年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达到其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掌握了宜兰、云林、嘉义和屏东四县的执政权。如果台北县、台中县市、台南县市和高雄县在 2009 年没有因为升格而推迟选举,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可能达到 7 个以上。如表 3 所示,就延举的 6 个县市而言,“泛绿”阵营在 2005 年的得票率约 46.7% ,按照跟 17 个县、市同样的增长幅度,假如这 6 个县、市在 2009 年也进行选举,民进党可望获得 52.5% 的得票率。与该党在 17 个县、市实际得票率(45.3%) 合计,民进党的总得票率可能冲到 48.9% 。与此相对照,“泛蓝”阵营在 2009 年 17 个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从 4 年前的总得票率 52.2% 下降到 50.5% 。按照同样的减幅推算,“泛蓝”上述 6 个县、市的得票率,也可能由 4 年前的 52.4%

降到 50.7% 。两者合计,“泛蓝”在 2009 年的得票率很可能是 50.6% ,只比民进党略高一些。但民进党在 23 个县市长选举的估算得票率 48.9% ,已经是历史的新高,意味着均衡两党体系的到来。

民进党实力回升的另一指标是在 2009 年 9 月以来的多次“立委”补选中,增加了 6 个席位,从原先的 27 席,增加到 33 席,占“立法院”总席次的比率将近 30% 。其中 3 个席位是由于国民党原当选“立委”因贿选被认定无效,使民进党得以推出在 2008 年“立委”选举中落选的三位候选人再次上阵,赢回席位。另外三个席位则源于国民党“立委”转换跑道,获选台东、桃园和新竹县长而出现空缺,民进党候选人赖坤成、黄仁杼和彭绍瑾,分别击败国民党籍候选人邝丽贞、陈学圣和郑永堂,获得这三个席位。原任台东县长邝丽贞未能接替黄健庭留下的空缺,原任嘉义县长陈明文却可以接替张花冠留下的“立委”席位,同样是转换跑道,成败结果迥异,从另一方面展现了两大政党政治实力的消长。补选结果对“立法院”政治生态的影响,由表 3 可以概见。

表 3 2008 年“立法院”选举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变化情况

时间	“区域立委”			“不分区立委”		原住民“立委”		合计		
	国民党	民进党	其它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其它*	国民党	民进党	其他
2008.1	57 席	13 席	3 席	20 席	14 席	4 席	2 席	81	27	5
2010.8	50 席	19 席	4 席	20 席	14 席	4 席	1 席	74	33	5

* 包括亲民党籍原住民“立委”林正二。2010 年 7 月林正二因被认定贿选而当选无效,不再补选,故现在“立法院”只有 112 个席位。

四、“北蓝南绿”格局的新变化

2010 年的“五都”选举催生了岛内“北蓝南绿”格局的新变化。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维持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执政优势,但民进党在选票上比国民党多 40 万,得票率比国民党多 5.3% ,明显领先。虽然,国民党候选人郝龙斌在台北市大胜民进党候选人苏贞昌 17 万票,朱立伦在新北市赢蔡英文 11 万票,胡志强在台中市险胜苏嘉全 3 万票,但国民党候选人郭添财在台南以 21 万之差败给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黄昭顺在高雄又以 50 万票之差

败给陈菊,国民党在中北部所得,远不及南部所失。

根据 2010 年之前三次市(县)长选举得票平均值,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大台中原来就处于领先地位(分别领先 17.7% , 2.9% 和 12.8%) ,在大台南和大高雄则处于落后地位(分别落后 11.6% 和 8.0%) ,2010 年的选举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格局,但民进党在台北市和台中市与国民党的差距明显缩小,在南部的领先优势明显增加。

国民党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打了一场成功的保卫战,但也流失了一些传统选票。台北市的选票结构历来“蓝”大于“绿”,民进党在台北市

从未获得过半选票。在2010年选举中,不少外界人士一度看好苏贞昌的选战和从政经验,认为其可能击败郝龙斌,打破民进党在该市得票记录。但选举结果表明,苏贞昌的得票数仅比前三次选举中“泛绿”得票数的均值多近6万票,比得票率的均值多2.7%,所得票数和得票率低于陈水扁在1998年创下的记录。郝龙斌的得票数比前三次选举中“泛蓝”得票数均值少1万多票,比得票率的均值少3.2%。如果只是对比最近的两次台北市长选举,国、民两党的得票,郝龙斌比2006年选举时多10.6万票,得票率增加近2%(从53.8%增至55.7%);苏贞昌也比当年参选的谢长廷多10.2万票,得票率增加近3%(从40.9%增至43.8%)。不过,如果将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在2006年的选票(53 281张)视为“泛蓝”票源,同时将台联候选人周玉蔻的选票(3 372张)视为“泛绿”票源,郝龙斌在执政四年后实际上只新增5.2万多张选票,得票率反而下降2%以上,“泛绿”的得票率则上升2%以上。

民进党在新北市本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泛蓝”在新北市得票率从1997年的41.1%,上升到2001年的48.2%,在2005年始以54.9%的得票率,取回执政权。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并非该党的首选人物,只是苏贞昌在国民党决定由朱立伦参选新北市后,擅自宣布参选台北市,才使民进党被迫调整选战部署。选举结果表明,蔡英文在新北市的得票数比前三次选举中民进党得票数的均值多25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多1.7%,但朱立伦的得票数也比前三次选举中“泛蓝”得票数的均值多32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多4个多百分点。但如果只是对比最近的两次选举,朱立伦的得票数较之五年前周锡玮的得票数仅增加12.7万,蔡英文的得票数则比五年前民进党候选人罗文嘉的得票数多约20.7万;在得票率上,周锡玮在2005年领先罗文嘉超过10%,这次朱立伦仅领先蔡英文5%以上。两种比较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不同。

国民党在大台中有着厚实的选票基础,现任台中市长胡志强的执政和公关能力首屈一指,但其战果却是差强人意。胡志强在大台中

的得票数比前三次选举中国国民党得票数的均值多15万多票,但得票率却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少2.7%。与此相反,民进党候选人苏嘉全所获选票比前三次选举中“泛绿”得票数的均值多26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猛增近8%。如果只是比较最近两次选举,胡志强的得票数比起“泛蓝”2005年在台中县、市的得票总数(690 872)固然多4万票,但苏嘉全的得票数则比当年得票总数(450 745)多将近25万票,并超过2010年大台中选举新增加的15万选民这一数目。“泛蓝”在2005年台中县、市的得票率约59.9%,比民进党的39.1%多出20%以上,这次仅以两个多百分点低空掠过,也令不少人跌破眼镜。

大台南是此次“五都”选举中最没有悬念的。国民党候选人郭添财的得票数比前三次选举中“泛蓝”得票数的均值多近6万票,但得票率却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少1.6%;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所获选票比前三次选举中“泛绿”得票数的均值多17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增加近8%。如果只是比较最近两次选举,郭添财的票数比起国民党2005年在台南县、市的得票总数(385 135)固然多2万多票,但赖清德的票数则比“泛绿”当年在台南县、市的得票总数(457 589)多16万多票,得票率增加7%。同时,“蓝、绿”在2005年台南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为46.0%比53.4%,相差7.4%,但到2010年得票率差距则扩大为20.8%,增加13.4%。

大高雄是此次“五都”选举中最有戏剧性的。由于民进党候选人杨秋兴脱党竞选,抢夺了不少“泛蓝”选票,使国民党候选人黄昭顺的得票数比前三次选举“泛蓝”得票数的均值少27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少23.5%以上;而民进党候选人陈菊所获选票比前三次选举中“泛绿”得票数的均值多12万多票,得票率比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增加近1%。如果只是比较最近两次选举,黄昭顺的票数比起国民党2005年在高雄县和2006年在高雄市的得票总数(622 318)少30万多票,但陈菊的票数则比“泛绿”当年得票总数(739 248)多8万多票。同时,“蓝、绿”在上一次的得票率为

45.6%比54.2% ,相差8.6% ,但到2010年得票率差距则扩大为32.3%。

杨秋兴在2010年大高雄选举中所获得的414 950张选票,究竟多少属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票源,难以准确估计,但可以根据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在大台南的选票增加的趋势予以推论,因为两地“蓝、绿”实力对比接近。如果杨秋兴没有独立参选,陈菊在大高雄的得票率可望较前三次选举的均值多8%,达到60%左右。^①国、民两党候选人在大高雄的得票率可能跟大台南一样,呈现四六对开的局面,也就是国民党候选人可能获得62万票,陈菊获得93万票,相差31万票。换言之,杨秋兴的41万张选票中,有30万张属“泛蓝”选票,11万张属“泛绿”选票。杨秋兴对陈菊的分票效应,远远小于对黄昭顺的“夹杀”威胁。

鉴于杨秋兴对国民党票源的蚕食,国民党在“五都”选举中的总得票数,与民进党的落差原本不会是40万票,而很可能是21万票。但即使如此,“泛蓝”在2009年17个县长选举中领先民进党22万多张选票(包括脱党参选的傅崐萇和张志明二人的选票)的优势,经过“五都”市长选举,已经基本荡然无存。当然,这两次选举的性质与即将来临的2012年两次大选不同,难以简单推论。但国民党的票源在南北地区不同程度的流失趋势,在今后一两年是否还会持续,却是值得观测的重要变量。

五、结 论

本文以2008年台湾“立法院”单席选区两票制和多年来县长、“直辖市”和最高领导人选举所实行的相对多数当选制为例,说明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有利于两党体系的形成。但选举制度变化对政党体系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就心理因素而言,政治人物和选民对新的选举制度的作用,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只有当实践表明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确实不利第三党存活的时候,人们才会调适原有的

政党认同,采取策略性投票行为。此外,台湾“立法院”保留了少部分的政党比例代表席位,以及县市议员(包括台北市和高雄市议员)选举仍是采取一区多席制,第三党或无党籍人士在一定时期尚有部分的存活空间,但不会影响到两党体系的发展趋势。2009年以来台湾的县长选举和“立委”补选表明,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从2008年的低谷回升。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所隐含的“赢者全拿”(The Winner Takes All)的政治逻辑,在“蓝”大于“绿”的选票结构下固然对国民党有利,但一旦“泛蓝”选民的投票意愿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选举结果的逆转。2010年的“五都”选举强化了台湾两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国民党虽然维持了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执政权,但在“五都”市长选举的总体得票上,明显落后于民进党。就2009年和2010年两次地方领导人选举的结果综而述之,“蓝、绿”的选票基础大致持平,今后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维持长期的优势均非易事。鉴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有源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基本支持者,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统“独”议题、两岸关系、涉外关系方面存在较明显的“蓝、绿”分野,有理由预料均衡两党体系和政党轮替,将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

参考文献:

- [1]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M]. New York: Wiley, 1963.
- [2]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3] Paul Pennings & Jan-Erik Lane, Comparing Party System Change [M]. New York: Rutledge, 1998.
- [4]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5] Jean Blondel. 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J]. Canadian Journal

^①如果仅仅对比两次选举,陈菊的得票率可望较上一次增加7%,超过61%，“蓝、绿”阵营在大高雄的得票差距甚至可能从上一轮的8.6%扩大到22%。

- of Political Science ,1968(2) .
- [6]Markku Laakso &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79(1) .
- [7]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 [8]John C. Grumm. Theories of Electoral Systems [J].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58(2) .
- [9]Peter Siavelis & Arturo Valenzuela. Electoral Engineering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The Legacy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le [M]. Arend Lijphart & Carlos H. Waisman(eds.) .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 [10]Harry Eckstein & David Apte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ader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11]Richard S. Katz.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Pippa Norris.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3]Maurice Duverger. Duverger’s Law: Forty Years Later [M]. Bernard Grofman & Arend Lijphart (eds.) .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14]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6]王业立. 比较选举制度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责任编辑 王金水

An Analysi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Party System in Taiwan

LIN G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30 , China)

Abstract: As the 2009 county magistrate elections , supplementary legislator elections , and 2010 municipal elections indicated , the political momentum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as resumed from its lowest point in 2008. Given the fact that both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DPP have their basic supporters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regions respectively , and that a “blue or green” dichotomy exists among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erms of identity , issues on unification and secession , cross-strait relations , and Taiwan’s external ties ,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a symmetric two party system and frequent power transfers between the two main part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Key Words: Electoral System; Party Systems; The Kuomintang;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